



房址出土筒形罐

祭祀坑出土彩陶罐

石刀

石磨盘和石磨棒

辽宁建平马鞍桥山遗址

探寻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遗址概况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西南约800米的小山梁上，当地俗称“马鞍桥山”，山势低矮、平缓开阔，自然面貌属于辽西地区典型的丘陵山地环境。遗址沿山梁分布，略呈椭圆形，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南距牛河梁遗址和西北距赤峰红山后遗址均约60千米，西距老哈河约2.5公里，海拔583米。

遗址所在区域在考古学上称之辽西地区，也有学者称该区域为燕山南北地区或辽西山地地区，在自然地理概念上指辽河和辽河主干以西的丘陵和山地区域。该地区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的区域，特别是在大凌河流域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址、祭祀遗址和高等级墓葬群，使该区域被公认为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也使其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重点区域。

为进一步对该区域内的红山文化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持续性研究工作，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大凌河上游地区开展了红山文化遗址专项考古调查、勘探、测绘和发掘等工作。遗址发现于2018年的考古调查工作中，2019年至2023年对其进行了连续五年的发掘工作，2021年遗址被纳入了“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对发掘工作制定了五个层次的总体学术目标：找寻红山文化的核心聚落址；揭示辽河境内红山文化聚落址内涵；补充“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要素；厘清与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的关系；探讨辽河地区与辽西河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址的关系。

主要收获

通过发掘工作确认，遗址性质为新石器时代聚落址，以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聚落址为主，还包含有兴隆洼文化遗存。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7700—5500年。遗址整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址在该时期出现，2023年发掘区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房址和灰坑，发掘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第二阶段为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址，2021和2022年发掘区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大型土台、祭祀坑和燎祭遗迹等祭祀性遗存。该时期聚落存在独立的居住区和祭祀区。

第三阶段为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址，2019—2023年发掘区均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房址、灰坑和壕沟等生活遗存，未发现独立的祭祀区。该阶段红山文化早期出现聚落环境，在红山文化中中期阶段环境较差。

三个阶段遗存的分布情况差别较大，目前只有第三阶段的红山文化的早期聚落发现有明确的环境围绕，分布范围较明确，同时还发现，该时期环境的西北段打破第二阶段红山文化早期的祭祀区，环境西南段打破第一阶段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其他两个阶段聚落址暂未发现明确分布边界，进而也说明了各阶段聚落址并非是完全重合的，聚落址的规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再根据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来看，三个阶段的遗迹均开口于一层表土下，未发现有明显的地层叠压关系，我们无法通过勘探等手段进一步确认具体分布范围，因而需要对进一步解剖发掘等方式来解决。

由于兴隆洼文化遗存只在2020年发掘区内发现一座灰坑，房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因而，在这里只对红山文化的生活遗存和祭祀遗存进行具体介绍。

红山文化生活遗存

以遗址第三阶段的红山文化早、中期居住址为例，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环境，布局方式是以大型房址为中心，小型房址和灰坑围绕在大型房址周围，聚落址外围有环境环绕。

环境 为人工挖掘而成。目前已对东壕、北壕、西壕和南壕部分位置进行了发掘，东、西壕呈直壕，方向为正南北走向，南、北壕呈圆弧形，推测环境整体分布形状近似运动场上“跑道”，周长约900米，圈定面积约54000平方米。在东壕T2439段内未发现壕沟迹象，推测该处应为环境的出入通道。沟体整体形状规整，上口宽大，底部窄小，斜直壁，平底，部分沟底内侧有生土二层台，外侧不见该种情况，上口宽约2、底宽约1.深约1.5米，其内堆积为多为黑褐色土堆积，也有黄褐色五花土堆积，堆积情况各段略有不同，出土文物较丰富，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少量的骨器、角器、贝壳和动物骨骼等。

房址

均为半地穴式，根据其形制大小和功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房址，面积约25—30平方米，为人居住的房屋，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或斜直壁，室内活动面多铺垫一层厚约5厘米含有大量白色小石子的垫土，较平整、坚硬，靠墙壁处有成排的柱洞，门道呈斜坡状，均位于东侧。在室内正对门道位置有一个深坑式灶址，平面呈圆角三角形，直壁或斜直壁，灶壁和灶底抹一层泥，个别灶内有二次改造使用抹两层泥的灶底。

房内堆积不分层，仅活动面踩踏较明显，其上所有堆积均可分为一层，遗迹多出土于屋内活动面上，以陶器为主，少量的石器、骨器、贝壳和动物骨骼等。此外，该类房址最特别的是在室内活动面上放置(或为埋葬)人骨，如在F1活动面上和灶址内放置了两具人骨，人骨均为二次捡骨，叠放在一起，并和完整陶器叠压着，在F5活动面上发现一具头骨和几段散乱的肢骨。

二类是小型房址，该类房址面积约2—8平方米。平面近圆角方形，没有门道和灶址，地面保存较好，铺垫一层含有白色小石子垫土层，较坚硬，四边各有数量不等的柱洞，出土文物较少。由于其面积较小，又没有取暖设施，因而其不适用于居住之用，再加上紧邻大型房址分布，推测其应为大型房址的附属建筑，为仓储之用的房屋。

灰坑 数量最多的遗迹，分布比较有规律，多集中围绕在房址周围。灰坑坑口平面多为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方形及不规则形等。坑壁多为直壁或斜直壁，坑底多为平底或斜坡底。多数灰坑堆积内为一层自然淤积堆积，出土文物多为零星碎陶片和石器骨器等，个别较深灰坑内堆积可分为多层，出土文物较丰富，可复原器物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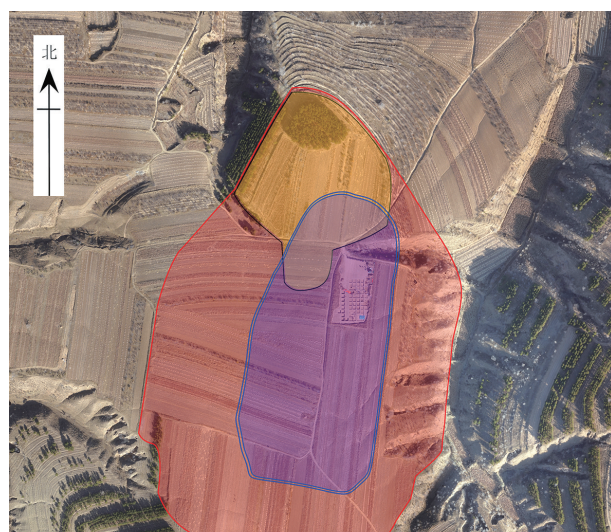
器物

生活遗物中陶器和石器占比数量最多，少量的骨器、角器、贝器、玉器等等，另外出土有少量的动物骨骼和贝壳类遗物。

陶器按质地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数量最多，以夹砂黑褐陶和红褐色为主，泥质陶也占有很大比例，以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器的胎体多厚重，胎体内



马鞍桥山遗址全景及发掘区分布情况



马鞍桥山遗址三阶段聚落址分布情况

砂粒大小较均匀，由于烧制火候不均或使用造成器表颜色局部多呈黑褐色和红褐色。器体内壁面光滑，外壁面较粗糙有丰富纹饰，样式有之字纹、直线纹、复线勾连纹、凹点纹、弦纹和篦点纹、附加堆纹等，器底多为篮纹和席纹。夹砂陶器以筒形罐为主，还有盆、碗、杯、器盖、板状器和塑件等。泥质陶器形制主要为钵，有少量盆和器座，以素面为主，少量彩陶器，纹饰多为黑色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纹和勾连纹等，纹饰多在钵口沿和器座腹部。

石器出土数量较多，多残缺，完整器较少。以磨制石器为主，器形有斧、锛、刀、锤、铲、粗、纺轮、磨盘、磨棒、有孔石器等。出土了大量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钻、镞等。此外，出土一件小型石雕人像，为一入全身像，呈双膝跪姿，双手扶于腿上，整体镂空雕刻，细小入微。

红山文化祭祀遗存

祭祀区 整体是一处经过两次精心规划设计与营建的祭祀场所。第一次的建设，是依托北部一座小山头，对东、西、北三面山坡进行修整，形成三层“梯田”形的祭祀场所，第三阶梯形制最为规整，平面为长方形，方向与山脊同向，向北偏东14度，南北长约180、东西宽约60米。第一、二阶梯形制不规整，仅西边缘为直墙，二者近平行，方向为北偏东24度，西南、西北转角均保存完好。第二次建设，是在第一次营建的祭祀区南部进行垫土，也是山梁被脊最低处，在该处经三次堆积成一座大型垫土台，使得鞍脊与南北两侧山脊相平齐，形成一个便于活动的平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祭祀场所，该垫土台平面近长方形，南部长约80、东西宽约60米。根据T0357北壁堆积情况可知，土台垫土堆积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褐色土堆积，厚约0.6米，第二层为黄褐色土堆积，厚约0.5米，第三层堆积为白黄色土堆积，厚约0.4米。

2021和2022年发掘区主要位于第二次建设的祭祀区内，第一次建设区仅对局部进行了解剖，因而发现祭祀坑和燎祭遗迹主要位于第二次建设的区域内。

祭祀坑 根据其形制大小和出土遗物种类情况，可分为大、中、小三类。

大型祭祀坑(JK1)1座，面积约30平方米。出土了各类型完整陶、石器31件，在坑的南部出土有大量疑似泥塑的红烧土块堆积。石器则出土了一套农具，其中包括播种用的石耜(犁)，收割用的石刀，加工谷物时使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其中一件涂有红色颜料的石耜也一并出土，据此推测，此坑应是专门为祭祀农业生产活动所做，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祈求农业丰收、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中型祭祀坑数量最多，形制较小，平面形状不一，出土遗物主要为之字纹筒形罐、彩陶壶、红陶钵和贝壳类器物，不见石器出土，此外，发现1座祭祀坑，只出土1具完整鹿类骨骼，不见其他种类遗物。

小型祭祀坑数量较少，形制规模最小，平面仅方形，面积约0.5平方米，出土遗物为筒形罐和泥质红陶钵(碗)。

燎祭遗迹 数量较少，仅发现3处。均在祭祀区地表经长时间火烧而成，红褐色土面堆积，平面为圆形，直径约1.2米，其内堆积为红烧土块、草木灰和木炭，不出土任何遗物。

马鞍桥山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

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内目前已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址，确认该遗址存在三个发展阶段，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为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该遗址的红山文化早期聚落整体保存完好，居住址区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外围有正南北向人工挖掘的形制规整环境围绕，发现的与生活相关的遗存均分布于其内部，遗迹又以大型房址为中心相对集中分布，大型房址整体呈南北向成排分布，大房址周围又分布着与其相关的小型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灰坑，这些特征为研究红山文化居住址的分布及布局规律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该聚落址内大型中心活动场所的发掘是此次工作最重要的发现，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聚落址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立的、大型的祭祀性遗迹，填补了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缺少低等级祭祀遗存的空白，为探究红山文化祭祀制度的形成、红山社会等级分层及红山聚落区域分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遗址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科学检测和分析，证明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已经开始大量种植谷物类农作物，其农业生产较发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红山文明的形成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进而也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执笔:白宝玉 李海波 樊圣英)

中国深海考古的重大突破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



工作母船“探索二号”李滨/摄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开展科考航次时，于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的海底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其中一处发现多个隔舱的船货堆积，以陶器为主，同时伴有金属器等其他质地文物，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一处为大量原木及少量陶器构成的堆积，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

为探明并掌握这两处深海沉船遗存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状况，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和工作安排，2023年5至6月、9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实施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第一、二阶段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为工作母船，通过“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共执行41个潜次，水中时间累计361小时31分。

主要开展并完成了以下工作：

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通过测深侧扫声呐等物探设备扫描及水下搜索探明了两处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对两处遗址进行了多角度、多种类的影像记录，完成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区、环形散落区、部分条形散落区和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区、散落区的摄影拼接。

完成了遗址三维激光扫描，初步实现沉船遗址水下真实场景的三维图像重建；使用了长基线、超短基线、惯性导航定位系统，潜载抽沙、吹沙装置，柔性机械抓手等多种新型技术和装备。

采集了海底沉积物、底层海水及海洋生物样品等；有针对性地对制订和总结深海考古调查的技术规范、策略和工作流程。

提取出水一批文物标本，进行了现场文物保护、信息采集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所在海底水温3℃，水中悬浮物较多，能见度约10米，海底，海床表面呈灰黄色，多为浮泥，堆积较薄，生长有少量海绵、冷水珊瑚等，浮泥下为灰白色松软海泥，地势整体较平缓，略有起伏。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铁器等构成的堆积，长约37米，宽约11米，可见10个分舱，堆积最高处与最低处相差约3米。环形散落区、条形散落区由散落的船载物品构成，遗物较少。

一号沉船遗址船体位于核心区，方向约350°，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板、底板等，船体结构不明。遗物包括但不限于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超十万件。陶器种类丰富，部分器物内盛装小件器物；铜器有盘、锁、器座、勺、环等；铁器有锅、锚等；发现木箱若干，有的木箱有金属包边，内装有铜盘、铜锁等。

两个阶段考古调查从一号沉船遗址共提取文物543件(套)，绝大多数为陶瓷器，仅有1枚铜钱(开元通宝)。陶器皆为酱釉，有罐、钵等，瓷器占比最大，有青釉、白釉、白釉、青花、红绿彩、绿釉、素三彩、珐华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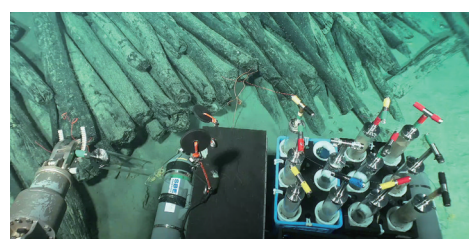
青釉瓷器有碗、盘、罐、玉壶春瓶，胎体较厚，采用刻划、剔划、模印等多种装饰技法，纹样有花卉、菊瓣、蕉叶、卷云、缠枝牡丹、仰莲等。青白釉瓷器有碗、盘，内外壁均暗刻花卉纹。白釉瓷器有碗、盘、杯、碟、钵、盒、炉等，多素面无纹，杯、碟内底心有蓝圈，部分碗、盘、杯圈足底有青花花押等款。青花瓷数量最多，器类丰富，以碗、盘、碟为大宗，碗、盘、碟内底装饰多见双圈弦纹内绘纹饰，主要纹饰有花卉、三果、月华、茱萸、团花、花木湖石、寿石牡丹、宝杵结带、鱼藻、麒麟、天马、翼龙、彩带狮子、莲池鸳鸯、仙人乘槎、梵文、“福”字等；外壁纹饰有缠枝番莲、缠枝灵芝、秋葵、松竹梅、连托杂宝、鲟鱼、应龙、人物、梵文等。另有罐、玉壶春瓶、执壶、军持等，颈部饰回纹、蕉叶纹，如意云头纹、卷草纹，肩部饰菊瓣纹，腹部饰缠枝番莲、葡萄、寿石菊花、龙纹、人物、梵文等，腿部饰莲瓣纹、仰莲纹等。红绿彩瓷器有碗、盘、杯，红绿色彩鲜艳，纹样有缠枝番莲纹、番莲、山茶花、莲池、鱼藻、仙人醉酒、莲池鱼、人物故事等。绿、黄、紫等单色釉瓷器有罐、玉壶春瓶、梅瓶等，内外均施釉，外施绿釉内施黄釉，外施黄釉内施绿釉，外施紫釉内施黄釉，釉质莹润光洁，以刻划花为主要装饰手法，纹样有蕉叶、卷草、折枝花卉、缠枝莲、仰莲等。蓝釉瓷器有瓶、执壶、扁壶、高足碗等，多素面无纹，素三彩有罐、执壶、罐外腹部贴塑折枝花卉纹，执壶为像生瓷，有象、鹤、螺等形。珐华器主要有梅瓶、罐等，采用沥粉方法勾勒纹样轮廓，以彩粉铺地，在纹样轮廓内填以各色彩釉，纹饰有云肩、璎珞、寿石牡丹、莲池、人物故事等。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海床浅表结构和地形与一号沉船遗址相近。遗址核心区为大量



一号沉船提取珐华梅瓶 李滨/摄

一号沉船提取青釉罐 李滨/摄



二号沉船遗址沉积物取样



从潜器舷窗看一号沉船遗址 李滨/摄

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南北长约21米、东西最宽约8米，方向25°，核心区西北及东部各有一处由少量原木和陶器散落形成的堆积。二号沉船遗址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铅锡器、螺壳、鹿角等。一、二阶段考古调查从二号沉船遗址共提取遗物36件，主要有原木、青瓷碗、罐、青花瓷碗、酱釉陶罐、瓶、螺壳、鹿角等。原木经初加工，被截成一定长度，整体呈黑色，质地较硬，少见海洋生物蛀蚀痕迹，青釉瓷器胎体较厚，素面无纹，青花瓷碗纹样有梅、花鸟、海螺等。

通过器形、纹样对比，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与江西景德镇新平公社墓、广东东莞雪松家族墓、湖北荆州熊氏家族墓等正德时期纪年墓，以及福建老牛礁、西沙群岛盘石屿一号、菲律宾利纳号等明代中期沉船的同类器物相近，其年代应为明正德时期。二号沉船遗址青花瓷碗上装饰的海纹、海螺纹与明弘治所见青花瓷碗风格一致，其年代为明弘治时期。

一号沉船遗址船体上部结构不存，海床表面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板、底板，二号沉船遗址海床表面仅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这些船板上皆发现大量海洋生物蛀蚀的孔洞。一号、二号船暴露在海床表面以上的船体缺失的原因之一可能来自海洋生物的长期蛀蚀。另外一号沉船遗址条形散落区可能是船舶下沉过程中船载物品不断洒落形成，而环形散落区则可能是船舶沉没触底猛烈撞击海床的瞬间船载物品向四周抛洒形成。

明代中期虽继续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但“朝贡贸易”“赏赐航海”不断萎缩，民间私人贸易日渐兴盛。在这种背景下，一号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二号沉船装载了从海外输入的木材，在同一海域首次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商船，推测一号、二号沉船皆为中国民间私人贸易商船。一号沉船的大宗货物——青花瓷器、青白釉瓷器等皆产自景德镇镇区，因此其始发港可能为广东或福建，经华南沿海沿岸航行后，从海南岛东部穿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沿越南中南部抵达马六甲等贸易中转地。二号沉船遗址原木标本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检测树种为栲属乌木，主要分布于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等热带地区，可用于制作家具；螺壳属夜光螺，主要分布于海南岛南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菲律宾、马来群岛等海域，夜光螺螺壳大，光泽度好，可用于制作工艺品、装饰品、乐器或法螺等；因此，二号沉船应是在马六甲等贸易中转地装载乌木和夜光螺螺壳后经越南中南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经海南岛东部，目的地为中国沿海港口。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对阐释我国海洋文明特质，推动文明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和突破性贡献。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的，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执笔:李剑 邓启江 陈传绪 于海明 图片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提供)